

论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中的儿童观^{*}

李利芳

(兰州大学 中文系, 甘肃 兰州 730000)

内容摘要: 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发展之初的儿童观呈现为“儿童本位”的特点。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 以成人为中心的“儿童教育观”成为主流并一直持续到新时期。在处于文化转型期的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儿童教育观”中以成人为中心的一元价值观逐渐消解, 儿童作为个体生命现象, 其主体地位开始回归。本文在考察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儿童观的理论发展的基础上, 提出在成人与儿童的两极世界中, 一种双主体规律的实现将是建立新型的当代儿童文学儿童观的途径。

关键词: 中国儿童文学; 儿童观; 群体; 个体

中图分类号: J0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04(2000)01-0140-05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是出现在“五四”之后。从这开始, 一批有识之士提出了崭新的儿童观并对儿童文学进行了认真的反思, 为“五四”之后现代儿童文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此前由于封建礼教对儿童人性的压抑和束缚, 儿童没有作为主体人的独立地位, 儿童文学也一直处于蒙昧状态。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 以民族的勃兴为目的, 对黑暗的封建制度进行反思, 开始审视人性的问题。人的发现与儿童的发现奠定了他们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基石: 即从关注儿童天性出发, 生成健全的人性。这同时也是他们对儿童文学艺术使命的全新理解。但不可忽视的是, “梁启超对倡导儿童歌咏和少年小说的热诚之背后, 是含有他一贯主导的政治功能(‘群治’)因素的。”^① 他的儿童观极具政治功利色彩, 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树人”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因此, 所谓的健全人性带有浓厚的社会化倾向, 而将此观点诉诸于儿童文学, 也倾向于发挥它的社会功能。

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 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 个体自主的主体意识与对面向世界的开放性思维的强调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对旧的传统观念的彻底背离与对新文化传统的热情营建成为一个时代的共同追求, 这尤其表现在一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身上。作为革新思想观念的先驱者, 他们对人性问题的普遍关注与理性思考导致他们对儿童问题的直接介入和对儿童文学创作的热情参与。在突出强调以个体为本位的“五四”文化氛围中, 儿童作为生命主体的地位也随之被发现了。尊重儿童独特的心灵世界和精神需求成为先驱者们的一致呼声。随着杜威“儿童中心主义”教育思想的传入, 正式催生了“五四”时期“儿童本位”的观念。在当时, “儿童本位”理论的集中表述者主要以郭沫若、鲁迅、周作

* 收稿日期: 1997-10-16.

作者简介: 李利芳 (1973-), 女, 内蒙古丰镇人, 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人为代表。在具体理论阐述中，三人的理论立足点不尽相同。

郭沫若最早明确提出“儿童本位观”。他运用“儿童本位观”对儿童文学从本质上作了解释。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一文中，他认为：“儿童文学，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童话、童谣、剧曲），是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由儿童的感官以直溯于其精神堂奥，准依儿童心理的创造性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儿童文学其重感情与想象二者，大抵与诗的性质相同；其所不同者以儿童心理为主体，以儿童智力为标准而已。纯真的儿童文学家必同时是纯真的诗人，而诗人则未必人人能为儿童文学。故就创作方面言，必熟悉儿童心理或赤子之心未失的人，如化身而为婴儿自由地表现其情感与想象；就鉴赏方面而言，必使儿童感识之时，如出自自家心坎，于不识不知之间而与之起浑然化一的作用。能依据儿童心理而不用儿童本位的文字以表现，不能起此浑化作用。仅用儿童本位的文字以表示成人的心理，亦不能起此浑化作用。”^②郭沫若在考察儿童文学特殊性的同时，提出了儿童文学艺术构成之关键——儿童本位性。这一观点得到了儿童文学理论界的认可，并以此确立了现代儿童文学的文学立场和文学出发点，形成了崭新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

鲁迅阐述的“儿童本位”思想将之与中国具体国情联系起来，发现儿童问题与民族发展的密切关系。他提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就是“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来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③提出要想振兴民族，就得解放儿童。“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④这即鲁迅的变“长者本位”为“幼者本位”的思想，是“儿童本位”的另一种提法。

周作人的“儿童本位”思想主要偏重于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来认识儿童，是他“自然人性论”的一个发展。运用西方人类学派的观点，他对儿童心理进行了原生性的意义观照，将儿童心理与原始人类心理并同。“儿童没有一个不是拜物教的，他相信草木能思想，猫狗能说话正是当然的事”，“就儿童本身上说，在他想象力发展的时代，确有这种空想作品的需要，我们大人无论凭了什么神呀皇帝呀国家呀的神圣之名，都没有剥夺他们的这需要的权利，正如我们没有剥夺他们衣食的权利一样。”^⑤对于儿童身体，他认为“玩”总是儿童自然本能的创作，是无目的无意识的，“他这样的玩，不但是得到了游戏的三昧，并且也得到了艺术的化境。这种忘我地造作或享受之快乐几乎具有宗教的高尚的意义……我们走过了童年，赶不着艺术的人，不容易得到这个心境，但是虽不能至，必向往之”^⑥。高度突出儿童的自然天性，主张儿童成长顺乎自然便构成了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观。他的这一观点是他关于“人”、关于“人性”健全发展积极思考的一个方面。这种对儿童本体的深切关怀，从“学理”层面上来讲，不失为儿童研究的一条科学途径。但纯粹将儿童置于生物学意义上理解，忽视社会现实生活对儿童的实际影响，使他的儿童观难免流于片面。

自“五四”崭新的儿童观形成以来，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创作开始走向繁荣。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由于特定历史时期的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以及中国数千年的以群体为本位的传统文化的巨大作用，使得“五四”时期初生的“儿童本位观”被传统的“儿童教育观”所代替。这种“儿童教育观”是中国传统文化面向现实、重视人生的实用理性思想下的产物。它重视成人作为已有经验的传导者的主体地位，将儿童置于一个群体概念中进行一种模型式的理想人格的塑造，以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儿童观以“群体”作为观照儿童的视角，从民族中心观念出发，强调儿童作为一个群体的主体精神和参与革命斗争的自觉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儿童观并没有完全泯却“五四”时期倡扬的那种自主的主体精神。它只是从对个体的充满浪漫情怀的精神探求中作出了理性的抉择。这种对群体主体精神的倡导应该说是“五四”儿童观的一种深层延续。在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带有社会化倾向的“儿童教育观”一直作为主流指导着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

二

革命战争年代儿童教育的目的旨在救亡图存，寻找民族出路。新中国诞生后，现代化国家的建立与发展又成为中国面临的艰巨任务。对新社会的真诚讴歌与对美好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之情成为一个时代人们普

遍的追求,热情参与政治也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这一时期的“儿童教育观”作为革命战争年代儿童观的内在延续,它具备了新的内涵: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希望,配合政治运动,教育他们“时刻准备着,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作为施教主体的一部分,成人儿童文学作家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一使命并通过文学创作实践着他们的教导。于是,儿童文学呈现出思想艺术高度集中、高度组织化的创作局面。同一叙事模式下相同的话语意义制造出一个又一个雷同的儿童形象。这些形象无一例外地丧失了自然天性与独立人格,仅作为成人主导话语指挥下的“木偶”而存在。这正如茅盾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当时儿童文学所作的批评:“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语言干巴巴。”⁷⁷一个时期,此种“儿童教育”思想统领着整个儿童文学领域,显示着它浓重的社会化倾向。

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文艺界对人和人性进行集体反思,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和强化,儿童的主体地位也开始重新确定。在创作领域,传统的听话、顺从、惟惟诺诺的儿童文学形象已被一批饱含时代特色、敢想敢干、富于挑战意味、充满阳刚之气的新人格形象所代替。这是创作领域对儿童人格的重建。与之交相辉映的是理论界全方位、多角度关注儿童人格的学术姿态。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统领儿童文学的“儿童教育”思想对新时期儿童观仍影响至深。这突出体现于曹文轩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的著名观点之中。这一观点要求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应以一种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创作姿态进入儿童文学创作领域,同时也暗含了对一种朝气蓬勃的、充满未来社会特色的儿童人格的呼唤。但是,从这一极具“未来”特色的儿童观的理论渊源却不难看出“未来民族性格”的意义指向是世纪之初的“健全人性”的继承和发展。对此,汤锐曾有论述:“‘塑造未来民族性格’,这是一个充满忧患情绪,强调社会责任感,具有功利性质的观念,是传统儿童文学之主旋律‘树人’观念的延伸和变奏,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⁷⁸

与以前的“儿童教育”思想相比,曹文轩的观点明显进步了。这是因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儿童自身对五光十色、丰富复杂的现实人生多了不自觉的社会参与,成人社会的开放观念对儿童重新思考,使得曹文轩的这一儿童观的社会化倾向已不仅仅是社会政治的工具,而是儿童面向社会,成人也将儿童全面置于社会后形成的一种开放的社会化倾向。无疑,让儿童脱离社会现实生活,让儿童文学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对全面认识儿童来说,是不切实际的。而在复杂的客观现实中关照儿童,才是全面认识儿童的合理途径之一。

创作实践本身对儿童人格的自觉重建,理论界再次从概念上予以廓清与凸现,使得儿童的全面社会化成为新时期以来作家们力求表现的主题。这种追求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主要集中于突破题材“禁区”与开掘主题深度,以及表现人物时代性格等方面。之后作品开始关注社会文化背景与内涵,关注反映人生与人性的广度和深度,进而上升到从哲学的层面上来对人、对生命进行理性的思考。

新时期儿童观表现的另一主流是它的美学批评倾向。这一批评的代表人物是班马。受“五四”时期“儿童本位”思想以及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和发生认识论的影响,班马基于哲学立场对儿童作为人的一个发生阶段的生命现象进行把握。这种把握以对儿童本体的深切关怀为出发点,以整个人生、整个社会为参照,生发出一种“活”的儿童观,而非以往的“小”的儿童观。其具体理论探索在于:其一,突破了传统“童心”观念的理论悬空状态。他认为将儿童局限在年龄界限之内的“层次”意识,带来了一种对“儿童”生命时间的自我封闭状态。“我认为,对儿童的理解,是一个涉及到生命体和社会性的由来、生长的时间概念,对待这一活的生长物,应取一种线性的观点,而不能把少年儿童仅仅当成0~14岁的年限及其表现来对待。可以突破纯粹生理年龄和社会生活圈的界定,而应从局部的现状模拟走向张力的开放参照。”⁷⁹以此开放观念观照下的儿童,我们可以延伸出两条线。首先,“童年,向长大的一端延伸出一条未来发展线——生命的成长性,寄寓了无限的未来时光。”⁸⁰此种观照下,“新的儿童观的眼光,是从将来的角度回过头来看待现在状态下的儿童。现在时态的儿童,变成了将来时态的儿童。”⁸¹其次,“童年,又向生来的一端延伸出一条原始遗传线——我们习惯于儿童是新生的观念,而还比较陌生于儿童又是最古老的这一认识。”⁸²以此原始遗传线,我们正可以找寻本民族的深根和文化原型,“启示着我们从中去显示童年期特有的、超乎成人更易流露的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遗传信息。”⁸³这种开放的“线性”思维意识确立了一种新的观测点,以此正确把握儿童在人生总

结构中的位置。其二，班马的理论突破了闭锁在“学校”方位上的空间上的自我封闭的儿童观。认为传统上我们仅对儿童本身具体的学校生活空间进行认识，而忽视了儿童精神生活上的“投射”要求，忽视了儿童真正心理空间的需求，没有正确把握儿童在社会空间总结构中的位置。

班马的理论探讨之二是他的著名的“儿童反儿童化”的观点。班马认为，长期以来对儿童特点的理解一直流于表面，将儿童化视为儿童状态的最终追求，视为儿童文学的最高标准，这其实存在着极大的倒错。“当我们怀有尊重儿童的愿望竭力‘向下’俯就儿童的时候，是否却不知以儿童自己的心理视角恰恰是一种‘向上’的倾向？当我们致力于对儿童状态的欣赏和描摹时，是否竟没有理会到儿童的那种极欲摆脱童年而向往成年的心情？当成人作者追求着‘模仿’儿童之时，真正的儿童本身却正追求‘模仿’成人的活动？”^⑥

回顾古今中外的儿童阅读史，班马归纳出了一种“小人读大书”的现象。班马从儿童审美心理动力来阐释这一现象，认为“从现代的认识水平来探讨，‘儿童’已不再仅仅是天真、快乐、无忧无虑的那样一个童心世界。相反，儿童期其实是一个充满压抑感、焦虑感的困惑时期。”^⑦（班马的理论探讨范围主要是中高年级儿童。）这种焦虑、压抑、困惑是这一时期的儿童与环境发生极大冲突的具体表现。其原因是他们处处被大于自己的力量管制和约束，处于一种软弱的地位。由于极欲摆脱这种状况，具有“大”的象征意味的成人形象便成为他们的内心追求，而通过读大书正可满足这一心理能量的释放。

中高年级的儿童随着身心和认知结构的向前发展，随着“儿童自我中心状态”的褪去，他们真正的自我意识开始成长。这种自我意识的心理视角强烈地投向成人和成人的社会活动。而在现实生活中，班马认为儿童的这种心理投射是通过一种“游戏精神”来实现的，认为一方面游戏是一种原始的本能冲动，另一方面，它是社会性的压抑感下追求的释放。将游戏与“儿童反儿童化”相联系，班马着重分析了后者。“如果说‘儿童反儿童化’的特点在审美意识上还是潜藏在心理之中，那游戏则是可观性的外显形态了。”^⑧通过游戏，他们追求着想象中的自我实现，追求着自己的“成人梦”的实现。将“儿童反儿童化”的观点运用于儿童文学，班马认为，通过游戏来追慕成年仅是一种初级形态，而更高形态则是精神的扮演，通过文学作品，在广阔自由的精神想象领域实现心理投射和心理能量释放。班马的儿童观理论以具体深入的分析为基础，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美学理论体系，弥补了长期以来儿童文学界结构性缺失“儿童美学”这一范畴的理论空白。

三

考察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儿童观的发展脉络，一个鲜明的特征已呈现在我们面前。即儿童观总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两个截然对立的领域交错更替、互为补充地平行发展。这两个相对立的研究方向即是“重群体”——“儿童教育”与“重个体”——“儿童本位”。前者着重从社会历史批评角度，以时代、民族的大文化背景为理论基点来生发自己的儿童观。这种理论尺度将儿童看成是一个处于成人中心话语边缘的特定群体，以成人的价值尺度对儿童进行规范划一的集体教育，从而实现儿童之于民族、之于社会的价值与意义。它更突出成人的主体地位，突出儿童的群体性与社会性。

后者“重个体”的“儿童本位观”主要从美学哲学批评立场来关注儿童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体的本体生命价值。这一儿童观在现代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周作人。他重视儿童作为主体的人的自然性这一面，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解释儿童的种种行为意识，以尊重儿童的自然天性为其“儿童本位观”的理论内涵。到了当代，以班马为代表的颇具理论建树的中青年学者在受周作人“儿童本位”思想的启发影响下，以美学批评的方法建立了更为全面深入的儿童观。比之周作人，班马也重视儿童的自然天性，但他却并没有脱离社会仅以纯生物学的知识阐释儿童的自然性。而是将儿童置于广阔的生活空间，打破年龄界限的束缚，以拓展性的“一”的线性思维方式来认识儿童，强调传统文化、现实生活之于儿童的影响作用。在此基础上，他才分析儿童的身体、情感、生理心理结构机制，建立自己的儿童文学艺术思想的审美发生论。无疑，班马的审美发生论理论逻辑性很强，内容充实，极具穿透力。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在美学批评的方法中兼用了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

比如说对儿童的认识处理，他打破既有的时空限制，用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知识进行阐述。

班马的尝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一种综合性的思维方法可能会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实际上，对儿童的研究认识，我们完全可以兼取社会历史批评与美学批评两种方法之长处，将群体的儿童与个体的儿童、社会的儿童与自然的儿童放在一起互为参照地对比研究。前者的长处在于，它能发现在儿童个体生命社会化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成人主体教育，以及这种教育之于一个民族发展的深远意义——群体儿童的社会性价值。而后的长处在于，它尊重儿童的生命主体性，解释儿童生理心理的成长过程，揭示儿童的生理心理需要及其行为动机，并考察社会文化模式对儿童性格形成的制约作用，以及儿童的心理倾向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在二者长处的对比分析中，一种完整的儿童观理论必须是这两种理论长处的结合。在对儿童的社会性与自然性全面的观照下，成人的教育主体地位与儿童的生命主体地位同样重要。因此，在成人与儿童的两极世界中构建新型的当代儿童文学的儿童观，这种双主体性规律的实现将成为必由之途。由此，在我们的理论视野中，构成儿童观的两方——成人与儿童中的任何一方都不会再以中心话语地位自居而否定对方的存在价值，他们互为主体地独立存在。成人会尊重儿童自身的主体性特征，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同时成人也会作为社会经验的积累者发挥他们自身的主体性作用，去引导、激发、调动儿童潜在主体的发展。

当前的儿童文学理论界对双主体性规律尚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可喜的是，创作领域已敏感地把握到了这一规律并运用于创作实践。如《男生贾里》中，作为“父亲形象”的代言人的贾里爸爸与查老师已经懂得，理解与尊重儿童是教育他们健康成长的前提条件。作为长辈，同样也需要从子辈那里汲取知识，丰富自身。在这里，全知全能的传统“父亲”已隐退了，新一代的父亲们正伴随着他们的孩子一起成长。

注 释:

- ①③⑨ ⑩⑪⑫⑬班马. 前艺术思想 [M]. 福州: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6. 299. 299. 405. 406. 406. 407. 407.
- ② 转引自张香还. 中国儿童文学史 [M]. 杭州: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8. 181.
- ③④ 鲁迅全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132.
- ⑤ 周作人.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转引自钱理群. 周作人论 [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162.
- ⑥ 周作人. 陀螺·序. 转引自张菊香, 张铁荣编. 周作人研究资料 [C].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 306.
- ⑦ 茅盾. 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 [J]. 上海文学, 1961 (8).
- ⑭⑮⑯班马.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构想 [M]. 武汉: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0. 33. 38. 47.

On the Outlook on Childre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LI Li-f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 outlook on children is characterized by children's standard. In the 1930s, a mainstream of the adult-centered outlook on children's education was formed and lasted until the 80s and 90s when children began to recover as the subjec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outlook on children, this paper offers, between the extremes of adult and children, a double-subject approach to establishing a new perspective on children in contemporary children's literature.

Key words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outlook on children; collectivity; individuality

(责任编辑: 李向辉)